

茶叶与鸦片如何影响了历史的走向(一)

20世纪六七十年代，随着麦克尼尔的《西方的兴起》、沃勒斯坦的《现代世界体系》和布罗代尔的《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、经济和资本主义》等重要著作的诞生，全球史研究开始兴起，并逐渐成为国际学术界的“显学”。与我国以往的世界史研究不同，全球史不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进行叙述，而是以全球不同地区之间的关联和互动作为叙事对象。全球史研究的主题多种多样，但有关商品贸易的研究无疑最能体现其特色。这是因为，全球各地区之间的关联起初主要是通过商品贸易建立起来的，全球化的历史首先是经济全球化的历史。仲伟民教授的《茶叶与鸦片：

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》（以下简称《茶叶与鸦片》）可谓中国学界对于国际全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回应。

一、“王牌”货

仲伟民选择茶叶和鸦片作为研究对象，是因为“鸦片是19世纪中国进口额最大的商品，茶叶是19世纪中国出口额最大的商品”（《茶叶与鸦片》，中华书局2021年版，第36页）。这两种商品将19世纪的中国和英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，而中英两国的命运在19世纪出现天差地别的“大分流”，茶叶与鸦片不但是贯穿始终的见证者，也是最为有力的推动者。仲伟民把茶叶与鸦片视为“成瘾性消费品”（以下简称“瘾品”），属于布罗

代尔所说的“王牌”货（《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、经济和资本主义》第二卷，第435页）。

所谓“王牌”货，是相对于粮食等大宗商品而言。布罗代尔同时代的学者指出，对于15世纪的地中海而言，在贸易方面占首要地位的不是香料和胡椒，而是小麦等“大量近距离交易”。还有学者用数据证明，“在产业革命前夕，英国对外贸易额大大低于国内贸易额”。布罗代尔认为，相对于农民和“二千万法国人”，“贵族和路易十四”等少数人往往能起“更有决定意义的作用”。香料、胡椒以及各种各样的“瘾品”就是这样的“王牌”货。粮食产量看起来庞大，但绝大部分由生产者自己消费，用于出售的粮食，“给农民、地主和转售商留下的利润十分微薄，再分散到许多人的手里，真是所

剩无几”。“瘾品”等“王牌货”，则完全通过市场出售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些“王牌”货的产地都不在欧洲，想要获得这些商品，必须通过“远程贸易”。在交通不便的时代，“单靠距离就足以制造超额利润”。一公斤胡椒在印度产地值1至2克白银，在威尼斯达14至18克，在欧洲各消费国则达20至30克。正是这样的“超额利润”，刺激出了15、16世纪之交的地理大发现，也催生了东印度公司这样的超级商业组织。由于从欧洲到亚洲从事跨洋贸易，需要的资本特别巨大，不是个别商人能够承担的。例如英国东印度公司为第一次航海筹集到的资金高达68373英镑，而当时英国一个熟练技工一年的收入也只有10英镑，而这笔巨款是由215名股东集资而成。（羽田正：《东印度公司与亚洲之海》，第62页）在布罗代尔看来，远程贸易“不容置疑的优点”是它允许实行集中，从而使它成为推动资金流通和资本积累的无与伦比的动力。

与丝绸、瓷器、珠宝等“耐用品”不同，“瘾品”很快便会被消耗掉，需要再次购买。这使得瘾品的需求永无止境，瘾品贸易也永无止境。再则，瘾品的销售单位可大可小，特别是可以小到“连最穷的人都买得起”。这

使得瘾品售价下跌之后，不但能够迅速吸引更多新的消费者，还能使原有的消费者加大购买量。某种程度而言，在人的身体对瘾品的需求达到饱和和以前，瘾品的市场空间几乎是无穷无尽的。以英国人的茶叶消费为例。据《茶叶与鸦片》可知，英国获得茶叶的第一次记载是1664年，英国东印度公司从荷兰人手中用4镑5先令购买了22磅12盎司的茶叶。17世纪80年代，英国开始直接从中国进口茶叶，但一直到18世纪初，英国人的茶叶消费都是“非常有限的”。维尔纳·桑巴特在《奢侈与资本主义》中展示了18世纪英国茶叶“人均消费量”的增长：1700年人均0.01磅，1730年0.08磅，1760年0.2磅，1784年0.5磅。曾在非洲管理茶叶种植园的英国作家罗伊·莫克塞姆在《茶：嗜好、开拓与帝国》一书中写道：“18世纪的第一年，英国茶叶的消费量——即使加上走私茶叶——也不到10万磅；而到了该世纪的最后一年，茶叶的消费量达到了2300万磅，增长了200倍。”显然，英国人在18世纪逐渐养成了饮茶的习惯。1846年，英国输入的茶叶达到5650万磅，人均消费量达到1.7磅。英国众议院1845年的一份报告声称，“茶叶在英国的消费已经达到顶点”（威廉·乌克斯：《



《茶叶与鸦片——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》，仲伟民著，中华书局2021年11月第一版

《茶叶与鸦片》作者、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仲伟民